

新闻 大学

XIN
JEN
JA
XUE

2

复旦大学新闻系

新闻 大学

XIN WEN DA XUE

新闻大学

第二期

复旦大学新闻系主编

《新闻大学》编辑部出版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上海新华书店发行

地址：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

上海市期刊登记证第 308 号

印张 8 字数 232,000

定价：0.65 元



目 录

论传播工具 王 中 (3)

积累知识与新闻线索

——谈采访之道(二) 陆 治 (8)

· 新闻学理论 ·

马克思和恩格斯是怎样对待在报纸上开展批评的? 陈大维 (11)

试析报纸是“集体的组织者” 闻 言 (14)

传与传播 陈 颖 昭 (18)

报纸的源流 李 良 荣 (21)

传学的若干研究课题 居延安译述 (23)

要学会用眼睛采访 少 峰 (25)

新闻记者的采和访 郑 重 (28)

采访要沉到底 徐之华 (30)

头脑中要经常装着问题 贾 安 坤 (32)

火车上的采访 陈 乃 文 (34)

确是经验之谈 车 敏 (37)

笔 谈

· 新闻写作 ·

“角度”初探 夏鼎铭 (39)

漫谈新闻敏感 张骏德 (42)

风俗画·抒情诗·政论文

——恩格斯《从巴黎到伯尔尼》的写作特色 周胜林 (44)

一堂新闻写作课 熊 蕉 (47)

美国报纸新闻用语的特点 俞 璞 路 (49)

· 编辑与评论 ·

怎样选择稿件 叶春华 (52)

报纸评论的分类 丁法章 (55)

英美苏对外广播特点剖析 赵水福 (57)

日本记者工作一瞥 吴复民 (6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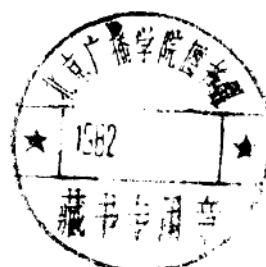
德意志新闻社参观记 黎 信 (63)

关于里根被刺的新闻报道 舒宗侨 (67)

美国《时代》杂志及其创办人——鲁斯 谢靖庄 (70)

哥伦比亚新闻研究生院简介 陈建德 (72)

国 际 新 闻 界



· 报史知识 ·

辛亥革命前后的报刊(续完).....	李龙牧	(73)
《申报》两记者延安之行.....	任嘉尧	(84)
《火星报》版面简介.....	秦中河 袁雪琴	(87)
珍贵报刊资料:《中华民国公报》.....	苏 凡	(89)
电视 电视广播一席谈.....	裴玉章	(91)
广播 谈广播的语言美.....	朱增朴	(94)

· 摄影·图片

谈谈战地新闻摄影.....	曹 宠	(97)
摄影曝光技术问答(二).....	马棣麟	(100)

|| 名记者 ||

“飘萍—枝笔，抵过十万军”.....	章玉梅	(103)
马拉与《人民之友报》.....	罗 星	(106)

· 自学漫谈 ·

学《笔记》的笔记.....	沈全梅	(108)
---------------	-----	-------

· 记者工作回忆 ·

最初的锻炼.....	张 凤	(110)
到前线去!		
——纪念前线记者曹秉衡殉难三十六周年.....	顾 膺	(113)

· 写作纵横谈 ·

人品与文品.....	林 帆	(117)
------------	-----	-------

· 古文选评 ·

因势利导 以理服人		
——读《孟子·齐桓晋文之事章》.....	张四维	(118)

|| 书刊评介 ||

韬奋的书刊深入到穷乡僻壤.....	杜 白	(121)
做人民的喉舌.....	碧 空	(122)

· 文章评析 ·

“青春作伴好还乡”之类.....	马 风	(124)
关于“一条街道，两个世界”.....	丁 名	(124)

· 社会调查 ·

重大新闻传播过程的调查.....	毛用雄(执笔)等	(125)
朴 多 还可精益求精	浦 北	(128)
白 多 日本摄影记者具备的条件	王之安 李竹铭	(102)
新闻照片好稿选(封二)		
战地新闻摄影图片(封三)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出版

上海市期刊发行证第303号

目 录

论传播工具 王 中 (3)

积累知识与新闻线索

——谈采访之道(二) 陆 治 (8)

· 新闻学理论 ·

马克思和恩格斯是怎样对待在报纸上开展批评的? 陈大堆 (11)

试析报纸是“集体的组织者” 闻 言 (14)

传与传播 陈 颖 昭 (18)

报纸的源流 李 良 荣 (21)

传学的若干研究课题 居延安译述 (23)

要学会用眼睛采访 少 峰 (25)

新闻记者的采和访 郑 重 (28)

采访要沉到底 徐之华 (30)

头脑中要经常装着问题 贾安坤 (32)

火车上的采访 陈乃文 (34)

确是经验之谈 车 辆 (37)

笔 谈

· 新闻写作 ·

“角度”初探 夏鼎铭 (39)

漫谈新闻敏感 张骏德 (42)

风俗画·抒情诗·政论文

——恩格斯《从巴黎到伯尔尼》的写作特色 周胜林 (44)

一堂新闻写作课 熊 蕙 (47)

美国报纸新闻用语的特点 俞璟璐 (49)

· 编辑与评论 ·

怎样选择稿件 叶春华 (52)

报纸评论的分类 丁法章 (55)

英美苏对外广播特点剖析 赵水福 (57)

日本记者工作一瞥 吴复民 (61)

德意志新闻社参观记 黎 信 (63)

关于里根被刺的新闻报道 舒宗侨 (67)

美国《时代》杂志及其创办人——鲁斯 谢靖庄 (70)

哥伦比亚新闻研究生院简介 陈建德 (72)

国 际 新 闻 界



· 报史知识 ·

辛亥革命前后的报刊(续完).....	李龙牧	(73)
《申报》两记者延安之行.....	任嘉尧	(84)
《火星报》版面简介.....	秦中河 袁雪琴	(87)
珍贵报刊资料:《中华民国公报》.....	苏 凡	(89)
电视 电视广播一席谈.....	裴玉章	(91)
广播 谈广播的语言美.....	朱增朴	(94)

· 摄影 · 图片

谈谈战地新闻摄影.....	曹 宠	(97)
摄影曝光技术问答(二).....	马棣麟	(100)

||| 名记者 |||

“飘萍一枝笔, 抵过十万军”.....	章玉梅	(103)
马拉与《人民之友报》.....	罗 星	(106)

· 自学漫谈 ·

学《笔记》的笔记.....	沈全梅	(108)
---------------	-----	-------

· 记者工作回忆 ·

最初的锻炼.....	张 凤	(110)
到前线去!		
——纪念前线记者曹秉衡殉难三十六周年.....	顾 麟	(113)

· 写作纵横谈 ·

人品与文品.....	林 帆	(117)
------------	-----	-------

· 古文选评 ·

因势利导 以理服人		
——读《孟子·齐桓晋文之事章》.....	张四维	(118)

||| 书刊评介 |||

韬奋的书刊深入到穷乡僻壤.....	杜 白	(121)
做人民的喉舌.....	碧 空	(122)

· 文章评析 ·

“青春作伴好还乡”之类.....	马 风	(124)
关于“一条街道, 两个世界”.....	丁 名	(124)

· 社会调查 ·

重大新闻传播过程的调查.....	毛用雄(执笔)等	(125)
补 还可精益求精	浦 北	(128)
白 日本摄影记者具备的条件	王之安 李竹铭	(102)
新闻照片好稿选(封二)		
战地新闻摄影图片(封三)		

论 传 播 工 具

王 中

本刊上期《论新闻》中说过，新闻现象是一个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在现实社会中发生的事，一般会被人们所知觉。但并不是任何事必然会引起人们的注意。一个事会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其中最主要的是一个事实的变动和人们关系的程度。凡是这一事实的变动涉及到人们的利或害，那么他们必然会去了解这种变动。既然人类社会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信息的沟通，伴随而来的就是传播的方式问题。传播的方式和信息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

本文要说明的就是各种传播工具的产生、发展，它们的功能以及特点。

一、因为有医院人才生病吗？

请大家想一个问题：是因为有人要生病才会有医院，还是因为有人想开医院人们才必须生病呢？生活在孤岛上的鲁宾逊会不会产生开一所医院的念头呢？

再想一个问题：在一个与世隔绝的三家村，会不会因为有人生病就造一所医院呢？我想不会。因为三户人家就算每户每天有一个人生病，也养不起那么多医务人员，连一个靠行医为生的“赤脚医生”也养不活。

有人大概以为这是非常幼稚的问题。可是这个幼稚的问题，对唯意志论者来说，还是一个高深的学问，传播工具是怎样产生的？就需要运用这个道理来研究。

最早的传播新闻是靠嘴巴，各人去打听自己需要的新闻，在封建社会的后期，商业、航海业已十分发达，象意大利的威尼斯是一个很大的港口。商人们十分需要了解各地的动态。有人就替他们打听船期、物价和沿途情况的新闻，谁需要就写信告诉他，取得一定的报酬。逐渐地，需要相同新闻的人多起来了，就手抄同样的消息出售给需要者。1566年，意大利还出现了“新闻房”，把各种新闻抄好，贴在一个房子的墙上，象展览会一样，谁要看，付一个小铜元进去看。小铜元叫Gazetta，以后此词成为报纸的代名词。需要同样新闻的人越来越多，手抄新闻也供不应求，就利用印刷所来印刷了。到后来，就象《共产党宣言》所讲的那样，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破坏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商品把一个民族连结起来，逐渐形成民族国家，也把整个世界联系起来；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决定了技术的不断革新，社会不断动荡，其变动的频率远远超过了凝固的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造成人口集中的城市；为了进行工业生产，资产阶级不得不实行普及教育，否则工人连图纸也看不懂，就不能进行工业生产。普及教育不是资产阶级的慈悲，而是他们进行工业生产的需要，这就造成了读者群。这些因素综合起来，就产生了面向社会的大众传播工具。最早产生的大众传播工具是报纸，以后逐步有了有线广播、无线广播、电视，外国目前还有电话新闻、电子报等。各种不同的传播工具是生产力（当然包括科学技术）水平所决定的。因为当时有纸张和印刷术，人们才能利用它来印报；发明了电话，人们才根据它的原理来搞有线广播；有了无线电传声，人们才搞广播电台，有了无线电传真，才有可能逐步发展成为电视机。就是说，生产力水平能提供什么工具，新闻事业就运用它作为自己的传播工具。这也好比看病一样，扁鹊、华

陀的医术再高明，也只能靠望、闻、问、切来诊断，绝对不可能搞出X光机来。这就是说，大众传播工具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而必然产生的，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的结果。

这种大众传播工具实际上不过是人的传播器官——咀巴的延伸罢了。就象咀巴讲话只有几个人最多上千人可以听清楚，要几万人都同时听见，就得凭借一种工具——扩音机。

然而，为什么大众传播工具只能产生在近代，而不可能在古代社会里产生呢？古代中国有印刷，是一批靠印报和卖报为生的行业。现在北京还有一条街叫报房胡同。但他们不是靠采写新闻为生，而以印卖为生的，就象我们现在不能把印刷厂和邮局叫做报社一样。古代社会不能产生大众传播工具也是由于生产方式决定的。中世纪的封建社会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人们和外界的联系极少，并不需要了解很多新闻；整个社会几乎是凝固不变的，变动极其缓慢，也不可能产生很多新闻。再加上封建专制主义的压制，因此，即使有像宋朝的“小报”，也很快被消灭。

二、汤团难道是煤球吗？

过去有人企图说明有了政党才有报纸，于是提出一个惊人的反问：“难道古代报纸是现代报纸吗？”实际上他自己已经在报纸上面加上区别词，这还有什么好问的呢？这和“汤团难道是煤球吗？”是一个逻辑。为了防止有人把汤团当作煤球，因此，必须给现代报纸下一个定义。根据现在我们认为是报纸的东西，定义大约可以说：报纸是以刊载新闻为主的定期连续向公众发行的印刷品。说是“大约”，因为也可以用其他方法来表述。这个定义，就可以把古代报纸和现在的电报、海报、喜报、丧报、大字报等等，划在报纸的外延之外，不要一望到有个“报”字，就当作是报纸。

下了定义以后，就十分明确地把古代报纸和现代报纸区别开来。所谓古代报纸是指宋朝的“小报”和各种邸报，清朝的“京报”，（“邸报”是通用词）。这类印刷物没有自己采写的新闻①，仅是皇帝的批示和大臣的奏折。但是客观上起着新闻的作用。如皇帝发圣旨，某某问斩，某某加官，那么你从这个圣谕中知道了宫廷内部的变动。还有某省巡抚奏折中报告该省遭水灾，报请皇帝减免税收，那么你从这个奏折中知道该省遭灾的情况。但皇帝批示和大臣奏折决不是新闻。这是和现代报纸主要区别之处。

读者也许看到一些书和文章中出现“报纸是×××工具”的说法，×××有几十种不同的字样。有些同志不了解这是怎么回事，其实这不是定义。如果有人当作定义来理解那是错误的。那么它是什么呢？是报纸的属性，是报纸这载体所运载的各种内容和周围发生种种关系的过程中的表现。属性几乎无限多，彼此可以并存，并不互相矛盾。例如金属接触电流时表现导电的属性，受压时表现为展性，受拉时表现为延性。铜，虽然绝大多数用作电线，但不排除它具有展性、延性。报纸也如此，它在和周围事物发表多种多样的联系，只要这样关系是存在的，而不是没有的，那么“报纸是×××工具”都是对的。除非这种联系是不可能的，那么这种属性也不存在。比方你办一份给鬼魂看的报，看看报纸有没有沟通阴阳的属性，既然鬼魂不存在，那么这种属性当然也没有的，说报纸是包公的游仙枕，这当然是荒谬了。“四人帮”曾反复讲“报纸是阶级斗争工具”，这也不能算错，问题在于是什么阶级对什么阶级的斗争。他们说是无产阶级同共产党里边的资产阶级斗，那是错的，如果说中国广大人民同封建法西斯集团作斗争，那就对了。现在说报纸是阶级斗争工具也是对的，五届人大二次会议上所指出那几种份子还存在，阶级斗争还存在，这种属性就不会消失。那么很明显，把金属的定义定为有导性的场质是不对的，把报纸的任何一种属性作为报纸的定义同样不正确。如果感到还难以理解，我们不妨打一个粗浅的比方——

① 有人认为邸报上曾有过自己采写的新闻，但是否确凿，有待考证。即使有，也是非常偶然的。

三、 咀巴是干什么的？

我曾经问过一个小孩，咀巴有什么用？他不加思索地回答：吃饭、讲话。其实，咀巴的作用何止吃饭、讲话呢？当鼻子塞住以后，咀巴就用它来呼吸，它不成了呼吸器官？咀巴可以接吻，表示爱情，咬牙切齿表示憎恨，这不成了传达感情的器官？在和敌人决斗时，还可以“以牙还牙”，这不成了“阶级斗争工具”？俗话说：“病从口入，祸从口出。”它岂又变成闯祸和得病的器官？到过火车站的人都可以看到，有的旅客进站检票时，他俩手提行李，只好用咀巴咬住票子，伸给检票员。此刻，咀巴又成了传递工具。还有许多实际用途。咀巴用在什么地方，此时此刻它就发挥什么作用。这种作用是相互不排斥的。

报纸的作用也类此。

就象不能抽出咀巴的一个作用定为咀巴的定义一样，我们同样不能抽出报纸的一个作用定为报纸的定义。

定义是形式逻辑的问题，就是要把一个概念的含义固定下来。定义要求概念的内涵稳定，无矛盾。被同义项不可以有许多不同的定义项，否则我们就无法进行思维交谈。辩证法和形式逻辑是高等数学和初等数学的关系，离开初等数学的基础，根本无法应用高等数学。辩证法是从事物的运动发展和普遍联系中考察问题，一事物在谈到不同的关系时，在不同的运动形态时，可以有不同说法。但是辩证法所使用的术语、词汇都必须严格遵守形式逻辑的规律。如果你问收音机的定义是什么？电视机的定义是什么？你去查查《辞海》看，《辞海》中绝不会用辩证法给它下定义。我想不去查它也可以，电视机、收音机也和咀巴的道理差不多。它每天那怕只播半个指头的新闻、从新闻传播角度来讲，就不能否认它是传播新闻的工具。它每天还播放大量的文艺节目、体育节目，又不能否认它是娱乐工具。它还用不少时间播广告，又变成商品推销工具。电视还办电视大学，经考试合格可以得到大学毕业证书，广播电台也开办各种讲座，它又是教育工具。如此等等，可以说出许多来。

那么让报纸、广播、电视发挥各种各样的作用，由谁来决定呢？由它的主持人。就象咀巴一样，你身上有咀巴，要它派什么用场，由你支配。谁掌握大众传播工具，就可由谁支配，这丝毫也没有什么神秘。

四、 从汽车说起

汽车大家都看到过。它可以载活人，也可以运死人；可以装美味糕，也可以装大粪垃圾；可以装讨人喜欢的音乐队，也可以装叫人心寒的武斗队。反正，只要汽车装得下的都可以装。报纸活象一辆汽车，科学的说法叫“载体”，外国人叫媒介，运载一切适合它运载的东西。

我记起有人说：报纸是个意识形态的东西。这话看来欠通。众所周知，意识形态不是个东西，报纸倒确实是个东西。那么两者是甚么关系呢？把此人的话改得通顺一下，应当是：报纸是可以运载各种意识形态的东西。那么可以运载哪些意识形态呢？请大家查查书本。意识形态分为政治思想（观念）、法律思想（观念）、道德、艺术、科学、哲学、宗教共七种。社会意识是人们对自己周围环境、社会关系、社会生活中各种现象的认识。而这些认识又以特殊的形式反映出来，因此就叫社会意识及其形式。这种社会意识是从不同的方面以不同的方式反映社会存在的。它们都有具体的名称。报纸几乎可以运载上述各种意识形态。

请读者注意，有些文章把政治思想错说成政治，把法律思想错说成法律。为什么是错的呢？政治思想是指人们对于社会政治制度、国家和其他政治组织、各阶级和社会集团在政治生活中的

各种关系的看法的总和。报纸能运载的仅仅是看法，但不能运载政治。报纸可以运载对国家的看法，无论如何不能运载一个国家。还有一种误解，报纸运载的是各种意识形态，包括上述所说的七种。但有人把这七种意识形态归结为政治一种。当然，对政治如此热衷，动机是可爱的，但不合乎马克思主义。

不知读者注意到没有，上述七种意识形态中，独独没有新闻意识形态。是不是马克思忘了或错了呢？我们不是“凡是”论者，决不相信凡是马克思没有说过的我们就不能发展。但我们相信，马克思一生办了许多报纸，写《资本论》时参阅了各种各样资产阶级报纸，并引用了这些报纸上的许多材料，当然不会粗枝大叶地遗忘了这一点。那么马克思引用资产阶级报纸上的材料是错了吗？也不错。马克思引用的仅仅是资产阶级报纸中所反映的事实，而不是用它们的观念。如果说新闻是一种政治的意识形态，那么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岂不成了资产阶级的政治吗？马克思不把新闻单独地列为一种意识形态是正确的。

意识形态都是一种观念，观念是对事实的一种看法。新闻不是对事实的看法，而是对事实的反映。翻翻通俗的哲学课本就可以知道，在唯物辩证法中有一章专讲存在和意识。这个“意识”是相对于存在而言，最简单的意识就是感觉，感觉的深化是思维。凡是存在于人脑里的反映都叫意识，新闻是意识的一种。而意识形态也叫“社会意识及其形式”，是相对于经济基础而言的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属于历史唯物主义部分。它们各有一个名称，就是上面所说的七种。因此，意识形态和意识是两个不同的东西，不能混为一谈。新闻既然是意识的一种，也不能和意识形态混为一谈。

那么新闻和意识形态有什么关系呢？当人们在反映事实时，可以用一定的观点，诸如政治观点、道德观点、哲学观点，来分析事实，并把这种观点结合事实来写新闻。事实上附着政治观念，就可列入政治思想这种意识形态，附着道德观念，就可列入道德这种意识形态，余此类推。凡附上一定观念的新闻均可分别纳入上述七种意识形态中的一种。但是只有特定形式的观念，没有事实，那不能构成新闻，只能是评论或学术论文。然而没有观念，只有事实的新闻却是存在的。在有一定观念的新闻中，新闻中的事实和观念是可以分离的，它不象意识形态那样，去掉了观念，什么也没有了。在新闻中，读者可以去掉观点，留下事实。就是因为这个特点，马克思在写《资本论》时，可以从带有鲜明的资产阶级观点的新闻中，获取有用的材料。在解放前夕的渣滓洞国民党集中营中，我地下党员完全从国民党报纸上所刊载的新闻中，编写共产党的《挺进报》。

五、报纸的分类

展眼世界的新闻事业，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报纸五彩缤纷，形形色色。

从办报的宗旨来分，有以赢利为目的的商业性报纸，以宣传一定的政治主张为目的的政治性报纸。

从报纸的阶级属性上分，有无产阶级报纸、资产阶级报纸、法西斯主义报纸，还有封建专制主义报纸。

从报纸内容分，有综合性报纸，专业性报纸。

从报纸出版时间分，有日报、早报、午报、晚报、夜报。

从报纸的印张分，有大报（一般对开）、小型报（一般四开）。

从发行范围分，有全国性报纸、地方性报纸。

从报纸的风格分，有严肃的高级报纸、通俗化报纸。

这样五花八门的报纸倒不是一开始就有了，而是以后逐渐发展起来的。从一定意义上说，报纸从简到繁的发展是寻求、发掘读者的共同兴趣的过程。在早期，由于文化人少，社会分工简单，

读者面窄，销路少，报纸基本上都是综合性的日报。随着生产力水平提高，社会分工复杂化，文化普及，读者面越来越广，包括各行各业、各个阶级、不同阶层，报纸追求越来越多的读者。但读者的面越广，共同兴趣的面就越窄，每个读者从报上感兴趣的东西就越少。这样，报纸就得有所侧重，针对不同阶层、不同地位、不同职业、不同趣味的各种报纸就应运而生。这种侧重某一方面的报纸，读者面小了，但对这部分读者来说，共同兴趣的东西就多了，每个读者得到的也就多了。这就是说，报纸的分工是从客观存在出发的，也是受生产力水平制约的，并不是人为的，想分就分，想合就合。

这里要强调的是，不管新闻事业的主持人制订什么样办报方针，针对哪部分读者，古今中外的报纸都有一个共同点：办报人并不是因为自己看报才办报，而是因为别人需要才办报的。而办报人所追求的则是利润或政治目的。一份报纸，只有当它能满足人们某一方面的需要，人们愿意读它、买它，那么办报人的目的才能达到。你想通过办报来赚钱，必须有销路，才能有钱可赚；你想通过它来宣传某一个政治主张，只有人们读了，才会产生影响。这好比办医院，不管办医院的人出于什么目的，它必须通过给病人治病才行，如果医院一个病人也不上门，医院只好关门。这虽则是起码的常识，但有些人却偏偏忘了这样常识。象“四人帮”办报就是这样，他们不管人们要不要读，不管人们的反感和厌恶，只要报纸印出来就是“辉煌胜利”。无产阶级的政党报纸要坚持党的立场，为人民办报，那就要以党的立场来选择人民所关心的事实，阐述人民所关切的问题，用光彩夺目的思想去照亮人心。而不是把党的立场和人民关心的问题对立起来。

至于一种传播工具应当包括哪些项目，看来好象可以按照主持人的意志和动机随意“创造”，其实并非如此。因为人们不能脱离历史去创造历史，只能在历史遗留下来的遗产上去创造历史。这是和“党的立场”是两回事。可参考李良荣同志《报纸的源流》一文，这里就不多说了。

六、各有千秋 长期并存

从历史发展的顺序看，各种传播工具可以这样排列：口头新闻、手抄新闻、印刷新闻、广播新闻、电视新闻。不管传播工具发展到那一步，在此以前所运用的各种工具在任何时候都是并存的，不能互相代替。口头新闻是最早的一种传播方式，但在任何时候不可缺少。诸位如不健忘的话，请问林彪完蛋，你从大众传播工具那里得知的吗？“四人帮”毁灭，你是从传播工具里得知的吗？都不是，当时是中央发文件，逐级口头传达的。另外有一种情况是不宜于传播工具传播，也是用口头传播，那些事实？大家想想就知道。还有一种是工具的主宰者认为对他们不利的消息，禁止传播。如江青的丑史，《红都女皇》事件，并没有见报，但当时许多人都知道。传播工具无论如何先进，嘴巴传播消息却没法废除，就象交通工具无论怎样先进，两条腿永远不能锯掉。

各种传播工具所以能够长期并存，因为它们各有自己的特点（长处和短处），不能完全互相代替。口头传播自由灵活，可以了解自己感兴趣的新闻，但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极大、传得不远。报纸的长处在于传播消息时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从古到今，从天上到地下，在一篇文章里可以无所不包；它便于人们阅读和研究，进行逐字逐句的推敲，阅读时可以跳跃，任选一段；可以留作资料长期保存。缺点是时间慢，接受者要有一定的文化程度。而广播和电视的共同优点在于迅速及时，可以随事实的变动同时播出；亲切，使听众、观众仿佛身临其境。特别适应于文化低的人。但共同的缺点是稍逝即过，不能推敲研究。电视的另一个长处是把形象和声音溶为一体。但它受各种条件的限制也较多，例如要有电源、能接受到电视波，携带也不便。因此，各种传播工具应该根据自己的特点，扬长避短。

但是，有人把口头新闻叫做原始新闻，把大众传播工具传播的新闻叫做报纸新闻，并认为报纸新闻比原始新闻可靠。这不能一概而论。十年浩劫中报上登的千万件冤假错案所列举的无数“罪

积累知识与新闻线索

谈采访之道（二）

陆治

知识越多越好，记者手头能掌握的新闻线索也是越多越好。求知识与掌握新闻线索，都要有个从少到多的过程，这就要靠自己平时勤奋积累和不断作深入研究。

采访工作，首先遇到的问题是新闻线索从何而来？除了自己发掘之外，还要靠他人提供。因此，在采访实践中广交朋友，多做一点人的工作，极为必要！采访中认识各色各样的人，对于这些人也要深入研究，从而有所选择的交朋友。这种朋友不仅对你今天的工作将有所帮助，而且在今后也能长期合作。我们既要善于广交朋友，又要善于向朋友们认真学习，努力扩展自己的知识领域与新闻线索。

结合我过去的经历来谈，一·二八淞沪抗战中所认识的采访对象，到热河失陷前夕还有用。举例而言，一九三二年二月上旬，我在闸北前线认识了一位十九路军七十八师炮兵营营长吴丹，他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我和他接触两、三次，谈得比较多，彼此留有深刻印象。翌年三月二日中午，正当我徘徊于陌生的承德街头时，又遇见了他。当时他已辞去十九路军军职，经朱庆澜老将军的介绍，到东北义勇军后援会中工作。用他当时的话来表达：“宁可不当

营长，不愿再打内战（指十九路军已奉命调闽，继续‘剿共’内战）。即使到东北义勇军去当兵，为抗日而战，也是死得其所”。当天晚上，汤玉麟率领部队弃城而逃，从小路奔袭承德的日军先头部队距城不到三十里。在此紧急关头，正是他深夜奔到玉成饭店寓所，力促我赶紧撤离，免得当日军俘虏。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二十日，十九路军将领联合各方人士在福州南校场召开“中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宣布成立人民革命政府（简称人民政府），公推李济深、冯玉祥（由余心清代表）、蔡廷锴、蒋光鼐、陈铭枢、黄琪翔、徐谦等十一人为政府委员，以李济深为主席，发表宣言，高举反蒋抗日的旗帜。这是在抗日问题上国民党内部又一次公开分裂，当然是件中外注视的重要政治新闻。上海《新闻报》派顾执中和我于十一月底赶往福州去采访，由于史量才早与十九路军将领在政治上比较接近，《申报》为避嫌起见，反而未派记者前往。

当时很难买到从上海去福州的船票，为了赶时间、争速度，特搭乘中国航空公司的水上飞机，从高昌庙的黄浦江上起飞，两小时以后，即在福州南台登陆，第一件事即按址访问《新

（上接第7页）

证”，有几件是真的？倒是所谓“原始新闻”可靠得多。大跃进时期报纸上报道某某地方亩产几万斤，有多少是真的？但家乡来的亲友会如实的告诉你张大伯、李大妈怎样死的消息。即使是电视新闻，也完全可以经过摆佈、处理，把假的东西放给你看。因此这不能一概而论。应当说现在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报纸新闻应比小道新闻可靠。另外，口头新闻也不能说是原始新闻，就象在上文《论新闻》中所说的，你自己做个试验，在现代社会里，有多少新闻你是通过大众传播工具得来的，那就明白了。

这是把新闻活动作为一个客观存在现象来讲的。作为科学，宣传是另外一种不同的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有它自身的特殊规律，这不是本文所谈的问题。

闻报》驻当地访员姚某(名字已记不起了)。他只能谈点表面现象：政变时，社会秩序安定，十九路军纪律也比较好，军民相处融洽。当地人中间，只有海军老前辈萨镇冰将军担任人民政府委员兼延平省省长，还有一位何公敢也参加新政府担任职务，其他各界人士大都抱观望态度。解放前，各报馆在各地聘请兼职访员，按月由报馆致酬二、三十元，规定供稿几篇，如能超额完成，或发来特殊消息，当另致稿费。这种访员和今天各报的通讯员虽同样是兼职，但实质上大有区别。今天的通讯员同志都在党的领导之下，具有强烈的政治责任感，他们正是各报记者得力的助手，新闻战线上的战友，这点是过去的访员远远不能相比的。例如，这位姚先生原是当地省政府的文牍，平时抄抄、写写，从官方的公文中摘录几条消息，未经采访、核实，即据此投寄报馆。从他看来，政变后继续当文牍，不过衙门口悬挂的招牌，由福建省政府改为人民革命政府而已。我们同他首次见面时，即发现此人谨小慎微，不愿多管闲事，生怕在政治上沾点边，得罪了上司，日后将摔破饭碗。约他同去访问十九路军将领时，他连连摇头，婉言谢绝。

我们即于翌日到福州附近的三华镇十九路军总部去访问蔡廷锴将军，因为我们早在一二八战争时相识，这次重逢显得格外亲切，招待我们共进午餐。蔡将军那次谈话比在上海时更加豪爽得多。他直截痛快说：“蒋介石不仅自己不抗日，还要消灭抗日的十九路军，曾经派特务企图暗杀我和蒋光鼐。从沪宁线上调我们到江西、福建边区打内战，我部区青年师曾受到很大损失。全军上下都从事实中得出教训，所谓剿共战争，这是老蒋借刀杀人之计。当前的敌人决不是中国共产党人，而是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我们和中共之间，可以在抗日的共同目标上谈判停战的，而事实上我们已经停了战。现在我们成立人民革命政府的目的，就是要号召全国，推翻卖国的蒋政府，促成对日抗战，实现中华民族的解放”。

走在福州街头，市面上都已挂了新国旗，其色样是由上红下蓝两横条组成，中间嵌着一颗金黄色的五角星。新国旗标志着什么意义，当

时未深究，反正，成立“中华共和国”及“人民革命政府”，改元易帜，这是人所共见。奇怪的是这样一次人民革命，政府竟没有在福州大规模地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来参加革命。听说在闽西一带曾发动农民，实行计口授田，但记者并未目睹其事，不能凭空瞎说。当时我在福州所见的，各界人民还是安居乐业，在日常生活上没有什么变动，也没有人因时局变化而逃难的。顾执中逗留福州五天，即匆匆返沪，他要我继续在当地采访，随时用专电和通讯的形式，向报馆报道时局消息。

人民政府殷勤招待我住在福州城里的招待所中，地点距政府机关报《人民日报》社址不远，同住的就有《人民日报》编辑部人员胡秋原、彭芳草夫妇和季步飞同志夫妇。季原是我上海新闻界的同业，我们早就相识，一起参加青年记者座谈的定期聚餐，我知道他是中共地下党党员。(解放后，他改名季明，曾任青岛市公安局局长、山东省人委办公室主任，“文化革命”前病逝。)他对我真诚、坦率，经常向我提供新闻线索并帮助我分析时局形势。当时最令人关切的问题是福建人民政府和中共方面在联合军事行动方面的谈判有何进展。人民政府曾派徐名鸿、陈孝航(即作家罗稷南)等赴苏区谈判，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也派张云逸、潘汉年到福州来洽谈。这是时局发展的关键问题，但由于我没有找到以上的关键人物进行直接采访，因此始终没有得到确实的消息。

招待所中还住着好几省的代表，有位安徽代表名王亚樵，据他自吹，曾在上海参加过暗杀宋子文的行动。其实，那次打死的是外交部次长唐有壬，宋子文并未遇害，但他向记者追述这段往事，状极得意。

我曾经到人民政府去访问李济深主席，由他的秘书麦朝枢引见。李主席头戴工人帽，穿一套土布中山装，从外表看，同一九三二年夏天我在苏州参加淞沪抗战阵亡将士追悼会上首次所见时，前后判若两人。当时他身穿草绿色的上将军服，腰束武装带，在追悼会上担任主祭，端庄、沉默，面呈悲愤之色，而这次他谈吐开朗，态度谦和，有长者风度。他向我不厌其详地解释政府公布的最低纲领，沉痛地指出

国难深重，一年年领土沦丧，非反蒋抗日不足以挽救民族危机。他介绍我去访问经济委员会代理主席余心清，他说余先生是冯玉祥将军的代表，他一贯提倡冯将军所力行的艰苦奋斗的作风，主张厉行节约，而且先从政府工作人员做起，以身作则。

果然，我访问经济委员会代理主席（该会主席是冯玉祥）余心清时，留下了深刻印象。我同他长谈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功败垂成的史实，他认为抗日救国是全国人民共同的愿望，即使在一九三三年上半年失败一次，仍当再接再厉，坚持抗日救国的事业到底。

此外，我还单独访问了陈铭枢、黄琪翔、章伯钧、李章达等新闻人物。曾经到南台青年会，出席过由外交部长陈友仁亲自主持的中外记者招待会。我记得那天出席者除当地中国记者之外，还有英、美报社记者二人。这位陈部长用流利的英语宣读讲稿，由程希孟担任翻译。

一九三三年冬天，日军已逼近长城线，俯瞰华北平原，但蒋介石仍坚持内战，置外患于不顾。福建人民政府一成立，他即视为心腹之患，决心用武力来消灭它。趁人民政府举棋未定之时，即迅速从各地调集二、三十万大军入闽作战，同时派飞机轰炸福州，威胁后方。我记得首次空袭是在十二月下旬，我住的招待所附近，掉下一块大石头，压坍一间旧屋，居民没有死伤。同时，人民政府庭院中也落下炸弹，竟未当场爆炸，亦未伤人。从此，人民政府宣布城防司令丘兆琛兼任防空司令职务，全城实行防空措施。可见十九路军当时对作战缺乏果断措施，行动迟缓，始终处于消极防御的被动地位，虽孤军奋战，结果仍被蒋介石策动的弹与子弹齐飞的攻势所击败。我在一九三四年一月初奉报馆电台，由闽江口的马尾搭轮船返沪。离开福州时，当地秩序井然，尚无战时状态。

从三三年的十一月底到三四年一月初，我在福州接触各方人物进行采访，所得的消息和新闻线索是不少的，但发回上海的专电和通讯，全部被国民党的新闻检查所扣留，报上只字未

登。从眼前的效果看，这次采访的结果似乎失败，但从长远观点、从记者平时需要积累知识和新闻线索以及广交朋友的角度来看，仍有收获。

事隔几年，到了抗战时期，不论在前线与后方，我同那次采访中见过面的李济深、蔡廷锴、陈铭枢、章伯钧、余心清、李章达等，重逢几次。历经多年来政治上的重大变化，彼此认识加深，相互间的信任也有所增进，这时见面再作深谈，更为开诚布公，所得到的消息和新闻线索更多、更翔实。象李济深将军，抗战初期曾任军事委员会战地党政委员会主任，一九三八年武汉失守之后，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驻桂林行营主任。当一九四一年皖南事变后，《新华日报》疏散一部份工作人员离渝，经过桂林时，八路军桂林办事处主任李克农同志劝我不要在当地找别人，还是直接访李济深将军最妥。不出所料，李将军就用行营的名义为我预订赴香港的机票，临行，他还派副官坐汽车护送我登上飞机，冲破了机场上国民党特务盘查的一关。

还记得一九三八年十月，广州、武汉失守以后，我在同年十二月初到第四战区去采访。当时广东的情况相当混乱，省主席吴铁城已逃往重庆，一去未返；国民党省党部和建设厅厅长曾养甫等逃到西江一带；十二集团军总司令余汉谋撤退到曲江附近的翁源县。我先到十二集团军驻地访余汉谋，此人对记者守口如瓶，尤其不愿谈广州失守的经过。幸而我在总司令部遇见参谋处长赵一肩（曾任十九路军参谋处长，一·二八战争时相识）和参议李章达，当晚他们两人把广州仓卒失守的真相，原原本本告诉了我，同时向我提供我军在北江和西江一带布防的情况，使我赴前线时心里有了谱。

类似的例子不再举了。我写此文的目的，不在于详叙福建人民政府这段史实或分析其成败，只是想根据我过去工作的实践，说明记者在采访中应注意积累知识与新闻线索，尤其重要的是从接触各方人士中，善于广交朋友并向他们虚心学习。

马克思恩格斯是怎样对待 在报纸上开展批评的？

陈 大 维

马克思和恩格斯始终都把开展批评看作是报刊的基本职能之一。他们认为，报刊应当通过针砭时弊、批评错误来发挥自己推动社会进步的作用。

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末和四十年代初开始从事革命的报刊活动的。当时，普鲁士以及整个德国的封建统治已经走到了尽头，社会非常黑暗。封建专制制度的种种弊端、它的腐朽性，都暴露得非常明显。马克思和恩格斯正是在这样一种历史条件下，作为革命民主主义者投身于报刊事业的。他们一踏进报界，立刻就遇到这样一个问题：对普鲁士的封建统治秩序采取什么态度？是歌功颂德，还是进行无情的揭露和批判？年轻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正直的报刊对于社会的弊病不能无动于衷，更不能歌功颂德，它应当向舆论揭露这些弊病，揭露反动统治者的种种罪行，并且批判它，鞭挞它，从而唤起人民群众的革命意识。

在报刊工作实践中，他们正是这样做的。马克思写的第一篇政论《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就是对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于1841年12月颁布的书报检查令的批评。以后马克思在《莱茵报》上发表的文章，也大都是对反动的封建统治的揭露和批判。例如，当他得知进步的资产阶级报纸《莱比锡总汇报》被普鲁士政府查封的消息以后，立即写了一组题为《〈莱比锡总汇报〉的查封》的文章，发表在《莱茵报》上，直接抨击普鲁士政府查禁进步报纸的野蛮行径。而他于1843年初发表在《莱茵报》上的《摩塞尔记者的辩护》一文，则以大量确凿的事实揭露了地主阶级在政府的支持和纵容下残酷压榨摩塞尔河沿岸地区酿造葡萄酒农民的罪行。恩格斯在这个时期为报刊所写的文章，也有许多是对地主、资产阶级以及反动的普鲁士政府的揭露和批判。他于1839年3—4月间发表在《德意志电讯报》上的那篇著名的《乌培河谷来信》，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例子。至于他们在《新莱茵报》上发表的大量的消息、通讯、评论和小品文等，则几乎全是对封建统治阶级以及窃取1848年革命成果的大资产阶级的揭露和批判。

对普鲁士封建统治进行揭露和批判，不可避免地要招致政府当局的刁难和迫害。可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一步也没有退却过。为了捍卫报刊的批评权利，他们同普鲁士政府的刁难和迫害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正是在这一斗争中，他们对在报刊上开展批评的问题发表了许多精辟的见解。他们认为，揭露社会的弊端并对它进行评论和批判，既是报刊的权利，也是报刊的义务。因为在他们看来，报刊的使命就是启发人们的头脑和促进历史的发展。而对社会弊端的揭露和批评，有助于完成这一使命。1842年11月，马克思在以《莱茵报》编辑伦纳德的名义写给莱茵省总督冯·沙培尔的抗议信中就庄严宣称：《莱茵报》“不是一些枯燥无味的学术文章和奴颜婢膝行为的毫无原则的混合物，而是以意识到自己崇高目的的批判精神来阐明国家大事和祖国设施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703页注334）。为了实现报刊的使命，马克思认为：“在报刊上治人者和治于人者同样可以批评对方的原则和要求，然而并不是在从属关系的范围内进行这种批评，而是作为公

民……在权利平等的情况下进行这种批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31页）为了反抗封建统治者对《新莱茵报》的迫害，马克思在1848年7月写了《法庭对〈新莱茵报〉的审讯》一文。马克思在这篇文章中针对普鲁士当局企图限制和取消报刊批评权利的阴谋，愤怒地问道：“难道有人想剥夺报刊评论人民代表的议会活动的权利吗？那末，又何必要报刊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203页）从这些论述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运用报刊来揭露和批评社会的弊端，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很早就开始坚持的一项报刊工作的基本原则。

综观马克思、恩格斯的全部报刊活动，有一点我们可以看得很明显，那就是，他们从事报刊活动的一个最重要的动机，是要通过报刊来宣传革命的思想和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而在当时的欧洲，由于资本主义制度的种种弊病已经开始日益明显地表现出来，因而各种各样的思潮、理论、学派，五花八门的救世药方，如雨后春笋般地冒了出来，多得不可胜数。为了向广大群众宣传真正科学的革命理论，把工人运动引上正确的轨道，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革命的报刊还应当担负起批判错误思想的任务。

早在1843年，马克思在同阿·卢格商讨办中的《德法年鉴》的编辑方针时，就在给卢格的信中提出，这个杂志的任务，“就是要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这里所说的“现存的一切”，除了指当时腐朽的社会制度以外，当然还包括当时泛滥于德国和欧洲思想界的种种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以至于封建阶级的思潮。以后，恩格斯在1847年10月发表的《共产主义者和卡尔·海因岑》一文中也说过这样的话：“党的任务是什么呢？首先是组织讨论，论证、阐发和捍卫党的要求，驳斥和推翻敌对党的妄想和论断。”（《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300页）在极其困难的斗争条件下，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直希望能够充分运用报刊来宣传自己的思想和理论，并对种种错误的思想和理论进行批判。这一点，直到晚年他们也没有忘怀。1877年7月18日，马克思在写给恩格斯的信中还说：“假如出现一种真正科学的社会主义杂志，那的确是很好的事。它将提供进行批评和反批评的可能性，并且我们还可以阐明一些理论问题，揭露教授和讲师们的绝顶无知，同时廓清广大公众（既包括工人，也包括资产者）的思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48页）

在《新莱茵报》和《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以后，艰巨的理论工作、繁忙的革命活动以及艰苦的物质条件，使得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可能再继续创办一份自己的报纸或刊物来从事革命思想和革命理论的宣传。但是他们仍然通过各种途径，坚持在报刊上开展对错误思想的批评和批判。他们的许多论战性的理论著作，差不多都是首先在报刊上发表的。其中最著名的有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机关报《前进报》上发表的《反杜林论》和在党的理论刊物《新时代》上发表的《哥达纲领批判》等。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在无产阶级政党的党内生活中，也应当贯彻革命的批判精神。恩格斯说过“批评是工人运动生命的要素，工人运动本身怎么能避免批评，想要禁止争论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324页）在党报实践活动中，他们始终坚持了这种革命的批判精神。

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各国工人政党相继诞生，出现了具有比较完备形态的无产阶级党报——党的机关报。

在党报上能不能对党内的以至于党的领导人员的错误思想和错误行为开展批评？这是当时这些报纸面临的一个不能不回答的问题。而马克思和恩格斯则用自己的实践对这个问题作了肯定的回答。同时，他们还对在党的报刊上如何正确地开展党内批评作了许多至今读来还有振聋发聩作用的重要指示。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曾经强调地指出，对党内的错误思想和错误行为进行斗争，这是无产阶级政党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条件。因此，他们从来都认为，通过报刊来开展党内批评是绝对必需的。在实践中，他们也始终坚持了这一点。例如，1885年，德国俾斯麦政府为了进一步推行其殖民主义的侵略政策，向国会提出了一个航运津贴法草案，要求通过。当时，德国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中

的多数人竟然表示要投票赞成这一法案。党团多数的这一错误决定引起了党的许多地方组织和广大党员群众的强烈不满和反对。在这期间，党的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发表了大量的文章和来信，对党团多数的错误进行斗争。恩格斯始终站在报纸一边，支持并亲自指导了这场斗争。五年以后，当他重新提到这段往事的时候，他再一次明确地表示：“当时我坚决站在编辑部这边反对党团。即使现在我还是会这样做，如果党团或者党的执行委员会真正做了任何对党有严重危险的事情的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78—79页）恩格斯的言论和他的行动都明白不过地告诉我们，他是完全赞成并支持在党的报刊上对党内的错误开展批评的。而批评所依据的原则只有一条，那就是，被批评的是“对党有严重危险的事情”，是错误的思想和错误的行为。只要是错误，就应该毫不容情地进行批评。恩格斯还说过，应当允许党的报刊“在纲领和既定策略的范围内可以自由地反对党所采取的某些步骤，并在不违反党的道德的范围内自由批评纲领和策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第518页）。这就是说，只要不违背党的纲领和既定的策略，只要不违背党的基本原则，党的报刊可以根据自己的判断，对党的某些具体政策和措施提出批评。而在当时，由于德国党还没有充分成熟，党内的许多人，包括一些领导人，还不同程度地受着错误思想的影响，因而党的纲领和策略往往会出现错误和偏差。在这种情况下，党的报刊对党的纲领和策略中的错误开展批评，不仅是应当允许的，而且是必要的。但是，这必须“在党的道德的范围内”进行。

当时也有人担心，在党的报刊上公开批评党的错误，会给敌人提供武器，被敌人利用。针对这种看法，恩格斯在1891年2月23日写给卡·考茨基的信中写道：“担心这封信（指1891年初在《新时代》杂志上首次发表的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一文。——笔者注）会给敌人提供武器，证明是没有根据的。恶意的诽谤当然是借任何理由都可以散布的。但是总的说来，这种无情的自我批评引起了敌人极大的惊愕，并使他们产生这样一种感觉：一个能给自己奉送这种东西的党该具有多么大的内在力量呵！……哪里还有另一个政党敢于这样做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第36页）敢于公开地在报刊上揭露并批评自己的错误，是一个党有力量的表现。而真正能做到这一点的，只有无产阶级的政党。

那末，是不是在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下，都一定要把党内的错误思想和错误行为公开地拿到报刊上来进行批评呢？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也不能绝对化。在这里，除了要看是否确实是错误以外，还有一条原则，就是要看当时所处的斗争环境和时机，看怎样做才对党有利；同时还应当讲究批评的方式方法。在这方面，他们也为我们提供了榜样。1891年初，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在《新时代》上公开发表以后，德国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里的一些人对此深为不满。党当时的机关报《前进报》也发表了一些反映这种不满情绪的文章。起初，恩格斯打算在报刊上写文章，公开批评他们。他在这一年3月4日写给阿·左尔格的信中说：“我当然要答复他们，但避免不必要的谩骂词句，不过没有一点儿讽刺也未必能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第42页）可是过了两个多星期，他考虑了左尔格提出的意见以后又表示：“是否要答复《前进报》的文章，我还没有决定，不过似乎开始倾向你的意见。有些问题我本来是应该谈一下的，但也许可以找到别的途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第54页）

对于那种不顾条件、不计后果、危害党的事业的破坏性批评，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来都是坚决反对的。1879年6月16日，恩格斯在写给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书记古根海姆的信中，就对该协会的机关报《自由》公开指责社会民主党议员在帝国国会中的立场提出批评。他说：“协会的机关报《自由》认为，对社会民主党议员们在帝国国会中的立场公开进行攻击是恰当的。虽然我也认为我们的个别议员在帝国国会中的一些发言是不恰当的（我一定会在适当的场合私下说出自己的意见），但无论如何我还是不同意《自由》所采取的批评方式，尤其不同意的是，认为这种方式的批评必须公开进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351页）1890年，当当时德国党内的小资产阶级半无政府主义的反对派“青年派”把持的《萨克森工人报》，利用恩格斯的威信，在报纸上